

目 录

导 言	1
<hr/>	
第一章 废奴小说与内战前兆	18
第一节 美国奴隶制与废奴小说	19
第二节 引起大战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	35
第三节 自由的代价：《为奴十二载》	52
第四节 梦幻之路：《地下铁道》	61
第五节 他者的另类叙事：《已知的世界》	76
第六节 内战的预演：《上帝鸟》	90
小结	98
<hr/>	
第二章 内战的毁灭性	99
第一节 兄弟相残的现代战争	100
第二节 战争与激情：《红色英勇勋章》	104
第三节 鏖战中的将军们：《杀戮天使》三部曲	115
第四节 战争洪流中的众生像：《大进军》	130
第五节 创伤与疗伤：《南方的寡妇》	138
第六节 内战中的普通人：比尔斯的短篇小说	146
小结	156

第三章 内战小说中的家与国	157
第一节 家乡州与国家认同	158
第二节 陷落的伊甸园：《飘》	161
第三节 重访战时的南方：《马奇》	173
第四节 内战中的家族史诗：《北方与南方》三部曲	179
第五节 故土上的流浪者：《冷山》和《走向加特林堡》	197
第六节 非虚构小说中的战时首都：《华盛顿的起床号》	210
小结	219
<hr/>	
第四章 作家抉择与内战小说	221
第一节 南北作家与战争主题	221
第二节 走向战争的年轻人：《马纳萨斯》	236
第三节 幻灭与复兴：《押沙龙，押沙龙！》	244
第四节 内战小说中的边缘人物	251
小结	265
<hr/>	
结语	267
<hr/>	
附录	273
<hr/>	
参考文献	284

导 言

美国的强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较少遭受战争蹂躏，总能在远离冲突的和平环境下保持高速发展。纵观美国历史，其本土发生的战争只有南北分裂导致的内战伤害最大。内战中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五倍，约36万北方联邦军士兵和25.8万南方邦联军士兵战死，其中三分之一是因为创伤没有得到及时和正确的医治而死亡。双方还各有大约27.5万名士兵残疾，另有41万士兵（包括19.5万名北方士兵和21.5万名南方士兵）永远记得过度拥挤和脏乱不堪的战俘集中营。在其中饱受煎熬的人们有着最糟糕的经历，例如佐治亚的安德森维尔战俘集中营就监禁了3.1万名北方士兵，到战争结束此处共计有1.2万座坟墓（纳什，2008：512）。内战的惨烈和根源的复杂性为文学创作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并由此产生独具特色的内战小说。这类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早期的尝试、20世纪后半期的繁荣和新世纪里的再度崛起三个阶段。内战小说在发展进程中从探寻冲突根源，分析参战激情，构思战争浪漫，描述被毁家园与重建，逐步到关注心理创伤，提供疗伤策略，以及从生态主义角度重新审视这场浩劫和以新的观点尝试重建内战历史。由于美国内战的特殊性，涉及这一主题的小说中优秀作品出现较晚，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更多作品面世。在新世纪开端的数年间呈现出难得的繁荣景象，涌现出一批佳作，特别是以《冷山》为代表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后，形成了美国文化在全球市场上的独特景观。追根溯源，内战小说中崇尚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国家认同等观念伴随美国价值观输出，对世界战争小说产生了

一定影响。美国作家在处理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题材时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对前者施与更多人文关怀，表现出对“兄弟相残”的无奈与悔恨，而对后者则以战争游戏化或黑色幽默方式凸显道德的模糊性和泛和平主义倾向。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改变美国国民性的越南战争，特别是“9·11”事件后，面临反恐严峻局势的今天，对美国内战小说的系统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内战爆发的根源

弗吉尼亚的夏洛茨维尔市在2007年因拆除内战著名将军罗伯特·李的塑像引起大规模骚乱，并触发各地对内战纪念物的快速处理，暴露出历经一个多世纪那场战争带来的创伤仍难治愈，种族矛盾依然存在，在新世纪反而加剧。白人至上主义的重新抬头和当局的新移民政策，以及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等举措，都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和探寻战争爆发的根源。导致影响深远的内战有诸多原因和历史必然性。南北双方发展不平衡，形成各自特点使冲突逐步加剧和公开化，最后走向分裂。1776年独立时美国只不过控制了大西洋沿岸的狭长地带，随后的向西扩张使其在内战前的1860年由原来13个州增加至33个，国土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南北之间的分歧也随这种扩展愈加明显。战争开始时南北双方的力量对比极为悬殊，北方有23个州、7处领地，人口共计2200万；南方只有11个州，人口才900余万。当时主要军工企业都在北方，这种潜能为北方取得最后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而主要产棉区南方在遭遇北方对海上运输线封锁后，无法换取所需的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联邦军队除了有源源不断的志愿兵外，还有186,000名黑人士兵参战效力，然而直到1863年南方才批准将20万黑人士兵编入军队，却由于惧怕他们叛乱从未使其参战（《大美百科全书》第六卷，1994：417—418）。人们普遍认为，“北方拥有选票、权力和生存的意志，而南方则只有传统及其捍卫者的个人胆识”（林顿，1984：170）。

从建国起在制宪问题上留下的隐患最终成为导火绳。1807年3月2日国会通过法令禁止黑奴进口贸易引起南方蓄奴州的不满，但这反而刺激了各州的黑奴交易，使南方许多种植园变相成为黑奴繁殖场。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为南北冲突埋下祸根，该州作为蓄奴州加入联邦，并规定

以北纬36° 30' 为界，此线以北为自由区，以南为蓄奴区，但新加入的州多数为自由州。表面上看，当时美国白人的生活水平高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居民，繁荣的经济吸引大规模移民到来，全部人口达3100万，刚刚超过不列颠。他们自认为是世上最文明、最幸运之人，但避而不谈的是政治自信中的极大缺陷：一是对印第安土著的血腥镇压暴露出的残酷；二是国土上居然存在罪恶的奴隶制，黑人的悲惨遭遇历历在目。这无疑是对建国宗旨“所有人生来平等”的莫大讽刺，也标志着新大陆伟大实验的失败（Farmer, 2008: 1—2）¹。著名废奴主义者加里森（William L. Garrison, 1805—1879）在1832年的“宪法与联邦”一文中指出，早期的美国宪法本身就掩饰了矛盾冲突，他预言随后的战争不可避免。从这种基于自由州与蓄奴州之间的安排，他质疑美国宪法的神圣性，认为实际上是“为维护世界上最为暴戾和邪恶的制度所做出的最血腥和最冒犯天威的妥协”（Nabers, 2006: 1）。林肯在1838年的演讲（史称“吕克昂演讲” <Lyceum Address>）中也指出，美国宪法这一神圣的工具开始滴滴人的鲜血，不断加重的大不敬情绪已向全国渗透，他大声疾呼“重振法律的尊严”（Lincoln, 2012: 32—33）。但在奴隶制问题与维护法律尊严两者之间，林肯更注重的是后者，即使后来内战爆发他也常常说明，战争最初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国家的分裂，而不是为了解放黑奴。

南北纷争由来已久，除奴隶制问题外，内战前国家的扩张和无序也使人们对国家认同模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边界不断变化和向前波动的国家。各州之间的共同感严重缺失，特别是当梅森-狄克森线的划定与密苏里妥协案的向西延长线确定双方未来势力的扩展范围后，留下明显的分裂预兆。内战前的扩张和地理上的不确定给美国社会和文化带来的复杂和多重影响是人们从未意识到的，也极为不利于民族性的形成。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一书里指出，如同地图制作的方法一样，民族主义也是空间建构和区划的一种方法。它使人们能够以某种想象的共同体中适当区域的设计时划分领地（Baker, 2006: 4）。到19世纪中叶美国的领土扩张已达到高峰，跨越整个大陆，甚至还有人提出向海外岛国索取领土。“新吞

¹ 本书所有英文参考文献对应的引文，除译本注明的，均由笔者翻译。

并的领土太多也意味着尚还年轻的国家的边界波动太大，这在实际边界和思想上两方面都令人惊叹，以至于19世纪许多美国人心里都难以想象出清晰的国家版图。”¹在领土吞并的同时也纳入许多文化、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完全不同的种族，人们担心自己总是与陌生人居住在国家的竞技场上，这难以成为有文化底蕴的共有之地。当时因信奉“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的狂热已难以控制，随之而来的是乐观主义之下的不安潜流。爱默生在日记里惊叹道：“美国毫无约束，扩散开来……混沌无形”（Baker, 2006: 1—2）。利曼·比切（Lyman Beecher,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的父亲）早在1819年就对同胞发出警告说，“我们的快速移民和耕地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国家罪恶”。他担心西部领地的并入和移民太快，将出现一个跨越阿勒格尼山脉（Alleghenies）的异族社会（alien society），全由土地投机者、更亲近于教皇和其欧洲同盟而不是美国的天主教徒和从未受过学校和教会文明影响的半野蛮的西部人所组成。他担心这个国家将变成绵延不绝的荒凉和血腥的边疆区（Baker, 2006: 3）。人们担心外国领地的并入必将改变联邦的性质，北方的自由会落入墨西哥的西班牙人或者南方混血儿的手中。这种并吞可能成为被并吞，改变人口的比例和实施并吞的权利也会让大家重新沦为殖民地附庸（Baker, 2006: 7）。为保持美国人种的纯洁性，在加州和德克萨斯并入时，议员们反对意见极大，有的认为，加州的居民主要是印第安人和混血的墨西哥人，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冒险家。容许德克萨斯作为蓄奴州并入不过是将其作为自由黑人输出的通道，让获得自由的黑奴离开的“安全阀”（a safety valve）。这些前奴隶将由此前往适应他们种族的气候的地方，因为在联邦中任何地方他们都无法找到生活在同类中的舒适之地（Baker, 2006: 121）。

建国以来作为基本国策的领土扩张同样促使美国走向分裂。南卡罗来纳的小说家兼评论员威廉·吉尔摩·西姆斯在信中为墨西哥战争辩护时说，“战争是现代文明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命运就是去征服别人。一个国家一旦停止扩张它的统治势力，它就会沦为虽处劣势

1 Anne Baker, *Heartless Immensity: Literature, Culture and Geography in Antebellum America*,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6, p.1.

但却富有生气的邻国的牺牲品”。墨西哥战争使加拿大人惊恐不已，赶紧加强对各松散州省份的联系，建立单一的统治。美国政府同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它下一步就是加紧对南方各州的镇压，当时它们企图脱离联邦，建立自己的共和国。人们意识到“蓄奴的南方已经与工业化的北方迥然不同，它们实际上已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了，作为两个抗争的集权单位，它们犹如两个欧洲国家，都想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对方”（威尔逊，1993：6“前言”）。南方人长期认为遭受北方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歧视，需要成为独立国家的呼声愈加高涨。

其实美国国会中有关分离的话题在19世纪初已开始逐步升温。在1814年针对国会动用州军队的特权，新英格兰的联邦主义者就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Hartford）集会，宣布反对国会这些特权，认为各州在极端情况下有权退出联邦。这被认为是联邦分裂的第一波信号。关于联邦分裂的争论到1832年进入炙热化。当年经过修改的税收法案通过后，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副总统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立刻辞职，该州宣布了自己的税收法令并表示如果强制执行联邦税法，该州将退出联邦。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总统认为此举就是叛国并派兵进入查尔斯顿，压制了这一脱离联邦的苗头。但此次“税法废除危机”触发的分裂的幽灵要到1865年才算平息下来（Grant，2012：160）。如果说南卡罗来纳的反税法危机是第二波的话，内战爆发则是此种思潮的决定性行动。其实维持统一或走向分裂的争议早已渗透全国，即使宗教信仰的约束也无济于事，而宗教组织本身早就开始分裂。内战爆发时南部长老会教徒就在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开会，公开宣布成立独立于北方长老会的南部邦联盟长老会最高宗教裁判会议。1856年约翰·布朗（John Brown，1800—1859）带领废奴主义激进分子攻打哈泼斯渡口（Harper's Ferry）兵工厂使得双方冲突白热化，林肯1860年的选举获胜更令南方绝望而走向战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将南方1861年在萨姆特堡的行动¹比作日本人1941年在珍珠港的偷袭，认为他们是被逼到无法逃脱的死角后才不得不发动战争。

在1860年林肯赢得大选时，南北双方都宣称自己继承了美国革命的遗产，具体内容分别指“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两份文件”，他们各有

¹ 内战爆发的标志是1861年4月12日南部军队进攻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堡（Fort Sumter）。

择重、各取所需。北方选择前者，强调人们生来平等；南方选择后者，希望依靠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和州权，从而延续奴隶制（Grant, 2012: 170）。这在1861年3月由新当选的南方邦联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Alexander Stephens）著名的萨凡纳演讲中就特别明显，他宣布南方邦联的宪法与1787年在费城起草的美国宪法不同，主要在于纠正独立宣言中的错误。斯蒂芬斯坦率指出，“成立美国的思想基于所有种族是平等的这种设想是一个错误”。因而邦联的宪法首先是保护奴隶作为私有财产。为强调新成立的南方邦联与之前国家的区别，他宣布：

我们新政府是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理念上，其基础建于和作为奠基石的是一种伟大的真理，那就是黑人不能与白人平等；奴隶从属于高等种族是自然和正常的状态。我们新政府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这种伟大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哲学的、道义的真理之上的。（Grant, 2012: 174）

这表明南方从国策上确认将继续施行奴隶制。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战争爆发后，南北双方都宣称不是为了奴隶制而开战，南方强调的是为了州权和宪法赋予的自由而抵抗入侵；北方则表示只是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反对国家的分裂。

内战的代价巨大，特别是南方，其适龄青年中就有四分之一死于战场。在美国历史上，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称谓一直存在争议，南方人称之为“州际战争”（The War Between the States），北方人则认为是“叛乱战争”（The War of Rebellion），有的甚至称之为“南方独立战争”（The War for Southern Independence）、“邦联战争”（The Confederate War）或者“分裂战争”（The War of Secession）等，最后普遍认为还是“内战”（Civil War）最合适（Farmer, 2008: 2）。从这些不同的称谓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内战看法的分歧。英国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资本的年代》（*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里指出，深究美国内战的本质和起因必将引起无休止的争论。他认为尽管奴隶制是引起这场大战的根源之一，但战争的胜利只不过是北方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不是黑人的胜利，不管他们是奴隶还是自由人”（Ford, 2005: 1）。美国内战爆发的根源主要在两方面：首先是因建国不久，国家认同感的缺失；其次是南方奴隶制的问题。这些都成为随后面世的内战小说的主要话题。

2. 内战小说的发展阶段

在对战争爆发的根源进行探索的同时，内战小说也着重揭示其影响和描述民众所经历的毁灭、重建和疗伤的过程。这些小说的主题涉及面广，主要关于：南北分裂的根源，国家认同与家园意识，作为首次现代战争的毁灭性，个人的战场经历，内战中的领袖作用，参战的黑奴与黑人士兵的贡献，内战中的女性与护理叙事，奴隶制与解放，内战与美国民族性的形成，个人主义与宪法权利，战争创伤与疗伤和内战中的家庭等。

内战小说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应从最早的废奴小说算起，这些猛烈抨击奴隶制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南方内战前已在精神上遭遇毁灭的社会现实，对战争的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家们借用建国功勋们的言辞质疑立国的根本，呼吁每个人都应享受自由与平等。这类作品里《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 具有代表性，斯托夫人以身处奴隶制枷锁的黑人的悲惨生活与种植园主的奢华的鲜明对比再现地狱般的南方，指出这与清教徒先辈在横渡大西洋的“五月花”上构想的天堂相去甚远。当初的移民中没人会预料到新大陆的后代居然堕落到施行、欣赏，甚至不惜捍卫血腥的奴隶制。林肯对斯托夫人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就是“引起这场伟大战争的书”时所道出的实情是，区域之间和政治上的敌意已被一种新的民族文学激起，要求社会在道义上必须转变并传播这种思想的文学作品加快了国家走向战争的步伐。

如此惨烈的内战突然降临到这“上帝应允之地”令人十分困惑，许多著名作家也不知所措，他们基本回避这一话题，只有少数人陆续作出反应，开始以此题材进行创作并质疑这场战争的意义和参战动机。较早的有曾任联邦军队军官的约翰·德福莱斯特 (John W. De Forest) 的《瑞夫纳小姐从脱离到忠诚的转变》(*Miss Ravenel's Conversion from Secession to Loyalty*, 1867)，重点探索了战争爆发的根源，他以女主人公转向支持北方事业的事实“象征战争造成的分裂创伤”，当时文坛风云人物豪威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¹ 认为该书可以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媲美 (埃利奥特, 1994: 419)。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斯蒂芬·克

1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其代表作为《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1885)。

莱恩 (Stephen Crane, 1871—1900) 的《红色英勇勋章》(*Red Badge of Courage*, 1895)。他在书中表现了极具冲动意识的英雄主义, 主要以自然主义手法揭示当时人们的参战心态。他写道: “纯粹的冲动统治着一切, 所有人都不能支配事件的发生或他们自己的行动” (埃利奥特, 1994: 438)。该书强调个人主义和自我保护, 这对后来的战争小说影响极大。克莱恩的小说显然带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他和马克·吐温一样, 其实是“将这场战争看作一出悲剧性的滑稽戏, 一种令人难受的笑话, 是对前辈作家和政治家的豪言壮语的扭曲” (Fuller, 2011: 221)。另一重要作品则是被称为“战争影响小说” (war effect novel) 的《飘》(*Gone with the Wind*, 1936)。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 (Margaret Mitchell) 既展示了战争的残酷性又描述了废墟中的浪漫史, 她在塑造内战和重建时期的神话时, 正值“美国面临国内困难考验的重要时期” (埃利奥特, 1994: 619)。米切尔同样注意到青年人的参战激情, 她极具反讽地描写了整个南方都陶醉在一股热情和激动之中。米切尔以思嘉·奥哈拉的苦难经历生动再现劫后的场景, 强调在遭遇灭顶之灾的南方只有这类人物才能勉强生存和渡过难关, 因为内战对南方的毁灭不仅仅在物质上, 对人们精神上的摧残更是难以言述。

为了南方的重建和疗伤, 作家们表现出对曾经悠闲的种植园生活的怀念和热衷于描写心满意足的奴隶, 并以此作为一种安抚和平衡。战争结束后这类怀旧乡愁的情绪显得越来越浓烈, 如豪威尔斯就在其乡土小说中着重表现“一种危机感和失落感, 一种对内战前人际关系密切的乡村一去不复还的怀旧感” (埃利奥特, 1994: 417)。当时特别令人感到轻松和缓解的是乔尔·钱德勒·哈里斯 (Joel Chandler Harris), 他的《雷穆斯大叔: 他的歌曲和语录》(*Uncle Remus: His Songs and His Sayings*, 1880) 曾被称为年度最畅销书。这位擅长运用黑人土语和黑人民间传说讲故事的作家“在轻松的幽默和对奴隶制与种族主义严厉抨击之间维持严格的平衡” (埃利奥特, 1994: 421)。对身处家园毁灭后的南方人而言, 这不乏是一种疗伤的策略。埃伦·格拉斯哥 (Ellen Glasgow, 1874—1945) 在表现内战的优秀小说《战地》(*The Battle-Ground*, 1902) 里同样强调表现“一个富于民间传说和思想素材的南方, 一个独特而骄傲的南方, 一个急切地希望在文学方面也如同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一样发扬富有

活力、连绵不绝的传统的南方”（埃利奥特，1994：423）。实际上从内战结束到20世纪初期，作家们都在尝试以描写骄傲的南方的方式展示其重建的效果和进行疗伤。但在他们的创作中区别是明显的，不少北方作家以此对灾难深重的南方加以安抚，而南方作家所想到的是以自己的传统和思乡情结促进文化上的复兴。

内战小说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迈克尔·萨拉（Michael Shaara）的《杀戮天使》（*The Killer Angels*, 1974），约翰·杰克斯（John Jakes）的内战三部曲：《北方与南方》（*North and South*, 1982）、《爱情与战争》（*Love and War*, 1984）和《天堂与地狱》（*Heaven and Hell*, 1987），以及霍华德·巴哈尔（Howard Bahr）的《黑色之花》（*The Black Flower*, 1997）等。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杀人文坛的黑马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zier），其处女作《冷山》（*Cold Mountain*, 1997）改编成电影（2003）之后影响更大。弗雷泽着重揭示人们的好战本性，如书中的邦联首领罗伯特·李将军（Robert E. Lee, 1807—1870）明确表示自己只是把战争看作澄清上帝隐晦意志的工具。李将军认为一切人类行为中战争的神圣性仅次于祷告和读《圣经》。弗雷泽总结说，“最喜欢战争的是李，如果可以自作主张，他会径直把大家统统送进地狱的大门”（弗雷泽，2004：8）。许多美国人，甚至历史学家常常将此次战争冲突称为兄弟之争，然而如此冷酷凶残真能出自兄弟之手？弗雷泽所揭示的是当时双方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对彼此毫不留情的毁灭。书中主人公英曼目睹虐杀对方伤兵的恶行时无动于衷，该情景最终成为藏于其心底的幽灵，永远无法摆脱。正如创伤理论家卡鲁斯（Cathy Caruth）所指出的那样：创伤是一种对人呐喊的受伤事件，它总是以一种延迟的方式尝试告诉我们真相（Caruth, 1996：4）。在战争的改变下，英曼与恋人重逢时双方都不敢贸然相认。四年外出征战后他返回家园时已成为陌生人，或者说是一名故乡土地上的梦游者。《冷山》这类小说还突出了作者的生态主义意识，强调美丽而寂静风景已难以抚平士兵内心的创伤。

第三阶段是指进入新世纪后更多内战题材小说的面世。杰拉丁·布鲁克斯（Geraldine Brooks, 1955—）基于路易莎·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 1832—1888）的名著《小妇人》（*Little Women*, 1869）

创作的《马奇》(*March*, 2005) 荣获普利策小说奖, 该书以奥尔科特小说里缺席的父亲马奇为主角, 深入南方揭示奴隶社会的真相, 更多关注战争对人性的扭曲。布鲁克斯指出内战的根源是因为在美国的一块土地上, “人们亵渎神灵, 产生腐败, 有罪恶之根, 行动的时刻到了”(布鲁克斯, 2007: 200—201)。该书详尽描述了奴隶主优雅面具后的虚伪和奴隶制的残酷。同年出版的另一重要作品是多克特罗(E. L. Doctorrow, 1931—2015)的史诗般巨作《大进军》(*The March*, 2005), 该书获2005年全国图书评论奖。多克特罗描绘了上百人的战时众生像和纵横千里的战争场景, 旨在重建内战历史。他尤其以白奴的遭遇告诫人们, 如果南方占了上风, 仅仅是白皮肤将不能保证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任何人都可能受制于契约, 被戴上脚镣手铐在拍卖场上被卖掉”(多克特罗, 2007: 159)。他指出最危险的是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奴隶制思想。多克特罗讲述了谢尔曼将军统领下的联邦军队对南方的毁灭性打击, 如在亚特兰大的纵火和掠夺使无数人遭遇浩劫, 其命运都被改变。多克特罗关注下层士兵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 在描述被战争洪流裹挟其中的这些人物时表现出极强的同情心, 并对将军们的武断和残忍加以谴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多克特罗在书中塑造了与白人同样睿智的黑人形象。内战中最为惨烈的战事发生在富兰克林小镇, 罗伯特·希克斯(Robert Hicks)的《南方的寡妇》(*The Widow of the South*, 2005)入微地描述了这种场景。仅仅在1864年11月30日的五个小时里就有9200人在此倒毙或身受重伤, 其伤亡程度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攻日”(D-Day)的19个小时鏖战, 甚至是珍珠港事件的两倍多。¹突如其来的打击令人猝不及防, 搅乱了小镇的宁静生活, 人们身不由己地卷入这场劫难。该书旨在让世人明白, 南方已被战争彻底改变, 创伤和磨难需要漫长的岁月抚平和愈合。

这些作品中凸显了一条南北之间的分界线, 标明了自由与奴役两重天地。实际上在美国文学的创作中长期以来都有较为典型的坐标, 向北意味着追求自由, 向南则是寻根, 向东走向文明与法制, 向西寻求冒险和机会。内战小说的创作则强调, 北方代表着权力和正义, 南方则是混乱与毁灭, 整个西部早已丧失话语权, 只是作为战利品静静等待被处置。

1 “D-Day”指盟军在法国北部的开始进攻日(1944年6月6日)。

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内战的结束对于主要居住在西部的印第安人意味着末日的来临。这种地域界限产生的差异和种族矛盾的冲突交织在一起，虽然历经一个多世纪隔阂依然存在，内战的创伤难以完全治愈。

从内战小说创作中也不难看出一些作家思想上的局限性。最为明显的是，这次战争的起因之一是奴隶制，但在许多作品里棘手的黑人问题却被忽略，他们对战争获胜的贡献也很少提及。战后人们才真正意识到妥善安置多达四百万获得解放的黑人的难度，南北双方在处理前奴隶的问题上分歧极大，对抗也与日俱增。黑奴获得解放后很难像其他人一样享受胜利果实，只因未能分得土地而成为依然遭受种植园主剥削的佃农。他们深陷的困境是：无法获得财产而沦为经济上的新奴隶。在美国要获得独立人格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权，这些被解放的自由民同样意识到追求幸福的权利与拥有财产的期待密不可分，他们获得解放的标志就是自身从财产变为财产拥有者。尽管如此，特别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战后自由黑人的社会地位问题促使其他少数裔移民反思自己的身份，黑人的解放促进了民族融合和多元化，他们与其他有色人种之间的联合强有力地抵御了白人种族主义的势力。然而内战小说家往往忽略这方面的成就。

其次是一些作品中有对印第安人形象的妖魔化，甚至将其描写为南方分裂主义的帮凶。这主要是因为战时的印第安人更同情南部邦联，而北方政府在对待土著居民时常常武断行事。在内战中的1862年8月份，处于半饥饿状态的苏族印第安部落在明尼苏达州起义，美国政府迅速调集军队应对，9月份时已完全镇压下去。到年底（12月26日）林肯还亲自下令对38名起义首领处以绞刑。内战结束和南北双方和解却意味着印第安人的灭顶之灾。他们虽然再次起义，但命运早已注定。1865年9月份3000多名苏族、切罗基族和阿拉巴赫族的印第安联合队伍很快被击败，摆脱了内战困扰的美国军队更加残酷地对待土著人的反抗并陆续将其迁往保留地严加控制。只有极少的作品揭示了印第安人悲惨的生存状态和遭遇的种族灭绝。

还应注意到的是内战小说中女性的声音普遍被压抑，许多人物甚至没有姓名，更谈不上话语权。《马奇》这类后期作品才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她们对内战的看法。她们认为男人们急于参战，表面上是为了理想，为了国家，但在同样身为战争受害者的女性看来：他们不过是在

“为虚幻的荣耀和空洞的喝彩而冲锋陷阵，留下我们在后面收拾残局。破碎的城市，焚烧的仓库，无端受到伤害的牲畜，我们养育的孩子和同床共枕的男人们残废的躯体”（布鲁克斯，2007：233）。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在有些作品中的不和谐声音的存在，如一些担心种族界限被模糊的作家甚至推出为三K党人辩护的小说。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的《豹斑》（*The Leopard's Spots*, 1902）和《同族人》（*The Clansman*, 1905）；格里菲斯（D. W. Griffith, 1875—1948）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居然得到一些深受蛊惑的观众的赞扬。人们不得不注意到内战小说的负面影响，如三K党组织的几起几伏就与之有关。成立于1866年的这一恐怖组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以复兴，大家普遍认为与格里菲斯的带有强烈种族主义的影片有着直接关联。该片将三K党获得成功的地区说成是中西部地区，而事实上应该是美国南部。许多社会底层的白人在观看此片后，都认为他们的贫穷是由黑人或者犹太银行家造成的，这种宣传手法与纳粹德国相类似。这部影片导致了三K党在全国的风行。在洛杉矶的试映式上，打扮成三K党成员模样的演员被雇用为广告宣传员，而之后在亚特兰大的首映式中，重新集结起来的三K党员走上街头欢呼雀跃。在有些地方，狂热的南方观众甚至朝舞台银幕开枪。其实这种倾向早在《汤姆叔叔的小屋》面世时就已出现，它使美国人在思想上产生极大分歧，因而随后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反汤姆文学”（anti-tom literature）作品。这种倾向说明多年来人们对内战意义的分歧较大，所持态度截然不同，这也是许多文坛巨匠不愿涉足该主题的原因。他们中有的认为“这既不是作为冒险的战争，也不是为了严肃事业的战争，这是最纯粹的战争，一种无心的巨大怒火与任何事业、理想或道德原则毫无关系”（多克特罗，2007：251）。

内战小说的发展已从探索冲突的起因、描述战争的残酷性和抨击奴隶制的罪恶转向强调女性的作用，提升黑人的历史文化地位，改变印第安人的形象，到关注创伤与疗伤和生态问题等方面。作家们充分运用后现代主义等各种创作方法不断推出佳作。尽管有众多作品面世，但与两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相比，内战仍是一场研究不深和尚未写透的战争。总体上看，内战使美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具有决定性改变，其标志是从以

爱默生等人为主导的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转向突出差异与特性和带有明显地方色彩（Regionalism）的创作，作家的视野从早期主要关注东部新英格兰地区扩大到全国。特别是在基本消除国家分裂的忧患之后，美国文学的创作主题更多地由欧洲事务回归本土，真正关注新大陆的特性和社会现实问题。

3. 内战小说研究的现状

在研究方面，国外虽然在《未书写的战争：美国作家与内战》《分离的家园》《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剑桥美国文学史》等专著中对少数作家和作品有一些评论，但由于大部分优秀作品出现较晚，因而研究成果较少。2007年在波士顿召开的美国文学国际会议上，来自其他国家和美国国内的有关专家就认为已到了对内战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系统研究的时候。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面世，如2005年甚至出现书名和主题相同的小说（我国在报道时为避免混淆，只好一部翻译为《马奇》，另一部为《大进军》），这类作品改编成电影后产生了极大影响。

我国对美国内战小说研究起步较晚，系统性的成果不多。这方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20世纪相关研究局限于对少数作品的介绍和分析，也表达了对美国内战的不同看法。重点关注的作品是对内战爆发起着重要作用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被称为战争浪漫曲的《飘》和普遍看作开美国现代战争小说先河的《红色英勇勋章》。这些书籍在国内接受的特点是都有较多译者，各出版社争相推出不同版本，在我国受欢迎的程度极高。我国最早出版的是由林纾1901年翻译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黑人吁天录》），他在该书的翻译过程中强调把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思考，将爱国主义思想寓于文学的教育职能，指出翻译外国小说的目的是要“使吾国民读之，用以为鉴，力臻于和平，以强吾国”（李岫、秦林芳，2001：13—14）。出版量较大的有2005年李自修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王岩译（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王家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2017年陈元飞译（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几个译本。董衡巽在其主编的《美国文学简史》中指出，《汤姆叔叔的小屋》揭露和控诉了蓄奴制，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但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弥漫全书的基督教的陈词滥调，特别是作者通过汤姆鼓吹的那些宽恕与顺从的说教”（董衡巽，2003：92）。

相比之下,《飘》在国内的译本更多,傅东华在1940年就翻译该书,这一译本197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再次推出。1990年出了三个译本:外国文学出版社(戴侃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陈良廷等译)和浙江文艺出版社(黄怀仁、朱攸若译)的版本。紧随其后的有2000年译林出版社(李美华译),200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贾文浩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范纯海、夏旻译)和201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黄建人译)的几种,可见国内读者对该书的喜爱程度。黄禄善在《美国通俗小说史》中将《飘》归为“长篇历史言情小说”,是有关内战时期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黄禄善,2003:256)。有的也认为《飘》的畅销主要因为它是具有戏剧性的历史小说,描写了一种没有实现的理想,一个失败的事业和一种消失的生活方式。它的重点不在于展示南方广阔的生活画面,而在于揭示个人生活的变迁(杨仁敬,1999:475)。同时人们也注意到“米切尔对南方历史变迁的描写是有失偏颇的。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南方农奴主破落的同情”(杨仁敬,1999:486)。同样译本众多的是《红色英勇勋章》,主要有199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徐齐平等译)、2003年青岛出版社(魏福平译)、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士聪、谷启楠译,书名译为《红色的英勇标志》)、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慎丹丹译)、2012年漓江出版社(黄建人译)、2012年中国致公出版社(刘荣跃译)以及2016年群星文化出版社(陈荣彬译)等版本。《红色英勇勋章》其实是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展现了内战荒诞的画面,成为“现代美国文学史上战争小说的鼻祖,影响了后来的作家如海明威等人”。克莱恩在其创作生涯中成功地运用了自然主义创作手法,以优秀的长短篇小说丰富了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传统(杨仁敬,1999:39—40)。他的《红色英勇勋章》是一部“参与文化政治运动,诠释战争和重新评价武装行为的著作”(杨金才,1999:94)。董衡巽指出,作者精细描写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主人公在战斗中的感受,使战争场面局限于个人所见,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新颖的写法对二十世纪的反战线上有一定的影响”(董衡巽,2003:171)。郭栖庆在文章中指出,作者从自然主义视角主要表现战争的荒谬性,他在小说中没有过多地描写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也没有塑造什么高大的英雄形象,而是侧重描写了参战士兵的心理活动,塑造了一个普通的年轻士兵的形象(郭栖庆,1994:60—61)。克莱恩通过亨利的战斗经历“解构

了美国民众笃信的英雄神话，促使他们深入思考英雄的真正含义”（胡亚敏，2014：99）。电影《红色英勇勋章》拍摄于1951年，是一部黑白电影，因此难以展示原著小说的丰富色彩；另外，一些影评家也指出了影片中的一些瑕疵，比如影片中士兵们穿越河流时，有人认出他们背上所背的是美国内战时期尚无的现代1903型步枪（刘仪华，2007：45）。

进入新世纪后美国内战小说的介绍引进的速度加快，这与《冷山》在2004年的翻译出版和电影发行的成功分不开。该书的中文本面世时编者总结说，《冷山》重新创造了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在我们的时代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并指出：“查尔斯·弗雷泽深刻地洞察到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孤独状态的危险，他对于社会的变迁，具有与那些十九世纪的伟大小说家同样敏锐的观察力”（弗雷泽，2004：扉页）。人们对电影《冷山》的评价也很高，因为它“展示了美国历史上那个最为惨烈的时期一场真正的美国奥德赛的英雄之旅”（周铁东、牛张莉，2004：4）。不难看出，弗雷泽对战争的处理别具一格，“书中没有任何战争场面的正面描写，它只以超现实的形式在英曼的梦魇中反复出现。但战争又无所不在，因为它笼罩了所有人物的生存状态”（李鸥，2001：511）。《冷山》的故事结构刻意模仿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从中也能体验到中国诗人寒山诗句的意境和赋予作家的创作灵感（刘聪颖，2007：22—23）。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2007年有三部重要作品的译本在国内同时面世：杰拉拉丁·布鲁克斯达的《马奇》、多克托罗的《大进军》和罗伯特·希克斯的《南方的寡妇》。早在1997年，美国著名内战小说家迈克·萨拉的长子杰夫·萨拉用父亲的《杀戮天使》的版税设立了“迈克·萨拉内战小说奖”以激励人们在这一领域的创作，杰夫自己也创作了被认为是《杀戮天使》前传的《众神与将军》和后传的《最后一击》。多克托罗《大进军》就成为2006年度的这一内战小说奖的得主。该书译者认为，多克托罗更多地描写了历史中的普通人，“人们在走向历史的时候，一开始看见的永远是英雄和伟人，因为英雄和伟人是历史的坐标。然而当人们深入历史的时候，他们看见的永远是民众，因为民众才是历史的本体”（多克托罗，2007：译后记）。《马奇》这部基于《小妇人》故事框架上的小说则“阐释了有关战争、自由及情爱的思考，为那遥远的时代赋予了永恒的人类话题”（布鲁克斯，2007：扉页）。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南方的寡妇》

向国内读者详尽描述发生在富兰克林小镇上那场鏖战的残酷性和战争创伤的后遗症。

在战争史专著里李公昭总结说，美国内战小说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沿袭库珀俗套，讲述战争加爱情的浪漫故事；二是现实主义地表现战争、反思战争、批判战争的作品，反映了严肃作家对重大问题的思考（李公昭，2012：80）。美国内战小说家主要强调昔日的朋友、兄弟、战友乃至亲人都不得不在这场浩劫中干戈相向，以说明内战就是一场“兄弟对兄弟、亲人对亲人”的战争。但有些作品表现出更为乐观的一面，如迈克·萨拉就推崇那个时代的英雄，因为他们都是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无论身处哪个阵营，都具有某些高贵品质。正是因为这些品质的存在，内战并不是撕裂美国社会的政治负担，反而成为一笔后人的精神财富（沙青青，2008：81）。

在系统研究内战小说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作家之间的差异。许多人在谈及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一般认为是为废除奴隶制而战，其实不然。即使林肯政府不得不走向战争也只是为了国家的统一，最初的打算并不是为了黑奴的自由。只要那些叛逆的州放弃独立的意愿，它们其实可以心安理得地保留奴隶制，延续旧日的生活。战争的爆发也与自认为能征善战的南方贵族的自信有关。人们谈及美国内战时更多地注意到战争的正义性，然而美国小说家们则纠结于怎样表现这样的战争。他们中一些人即使在颂扬战争中的英雄时，更多地谈及南北之间对同胞的残忍和战争的毁灭性，总希望这样的战争不必发生，而是让奴隶制在美国自生自灭为妙，而不用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他们在关键问题上甚至愿意牺牲黑奴的利益，显然不能将这类作家看得过于高尚。

美国战争小说有其特殊性，我国不少评论家和读者也较为关注，但从近年来的成果上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越南战争小说和朝鲜战争小说的居多，而关于美国内战题材的相对较少，还需更加系统的分析和从新的视角加以审视。在对美国内战小说的研究中，注意揭示作家们在主题选择和风格变化方面的原因，探索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和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更好地了解美国走向文化霸权的过程，把握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走向和促进中美文化的交流。著名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指出，“历史是通过意识形态的

决定作用而作用于文本的”（塞尔登，2000：506）。仔细阅读这些作品，不难看出美国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其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性，但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历年来国内国际政治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力。美国内战小说涉及的主题较多，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主要运用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创伤理论和后殖民批评等文艺理论，从废奴小说与内战、战争的毁灭性、内战中的家与国和作家的抉择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和论述。